



——关于城镇与区域经济的对话

● 费孝通 邱泽奇

1983年9月21日，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南京召开的“江苏小城镇研究讨论会”上发表了题为《小城镇、大问题》的演讲。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在读了这篇文章以后指出：“发展小城镇这件事，我们党内许多同志还没有接触过……这篇东西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能给人以一定的思想启迪。”由此，引发了对城镇化和乡镇工业发展问题的重视和广泛讨论。

20年来，尽管在中国小城镇的发展和城镇化道路问题的讨论中有各种观点，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观点，但这并没有实质性地影响事物按照自己的方向发展变化。以苏南为例，从社队工业发展而来的乡镇企业在经历了“民进公退”的改制以后，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从家户到城镇的工业集群；外资的大量引入促进了乡村工业的蜕变。工业的发展又导致了地区性产业结构的变化。人员的流动和职业的改变直接影响了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进而使得城镇化的水平不断发展。

为纪念《小城镇、大问题》发表20周年，2002年秋天费孝通先生再次回到家乡吴江进行调查研究，有关调查的文章《家乡二十年：小城镇大发展》已发表在本刊今年第8期上。

“蝉脱壳则能飞，蛇脱壳则能行”。文章写完之后，费孝通先生又与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共同展开讨论，回顾20年乡镇工业和城镇如蝉脱壳般发展的历程和由此产生的区域经济问题。这篇文章是费孝通先生与他的博士生、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邱泽奇教授的对话，编者作了一些删节。

邱泽奇(以下简称邱)：城镇的发展与支持城镇的社会经济体系是密不可分的，您在《小城镇、大问题》中对小城镇进行分类时依据的是这一点，对讨论城镇兴衰的时候依据的也是这一点。您还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小城镇的复苏和繁荣“是小型工业，特别是社队工业带动的结果”。

在后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您行行重行行，把自己研究精力的相当一部分放在社队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上，总结了以集体经济为主导的“苏南模式”。随后您又把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大，进一步总结了以个体和私营经济为主导的“温州模式”以及以外资为主导的、以来料加工为特色的“珠江模式”。这三种模式的乡镇企业在过去的20年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费孝通(以下简称费)：我可以先把过去的研究讲一讲。历史正在不断发展，我接触的面是在不断扩大之中的。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从苏南出发，研究中国各地方的发展，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看，发现了一些各不相同的发展模式。

我先讲“苏南模式”。改革开放的初期，实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与这个制度相应的变化就是公社时期的社队企业变成的集体所



有制的乡镇企业。

邱：苏南模式曾经是集体经济的代名词，这是有历史根源的，您在很多论述中都强调了这一点。例如您在《江村经济》一书中讨论了地少人多所产生的合作经营；在《小城镇、大问题》中特别强调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的基础是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工业。尽管农村的改革开放是从分田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但是工业生产的特征不容易使工业像土地那样化整为零。因此，苏南的乡镇企业采用集体所有制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也是它早期获得快速发展的制度基础。

费：保持集体所有制为苏南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积极的制度保证，也为后来的乡镇企业改制和工业的升级换代积累了原始资本。到后来实行“民进公退”的时候，苏南的经济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发展。1997年，吴江乡镇(不包括村)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就已经达到了100多亿元。

仅从劳动力的分布也可以看到这一点，1996年吴江市36万劳动力中，在企业就业的劳动力就有近20万人；1997年从事种植业的只有8万，这些人还不是全职的农业劳动力，他们在农闲的时候还会从事工业劳动。

因此，以集体所有制为特征的“苏南模式”，不仅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原始积累，也为外资的引进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培养了有素质的工人。

邱：后来我了解到，1997—1999年以“民进公退”为特点的乡镇企业改制虽然看起来有点不得已而为之，但却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从社队企业到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为后来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各种准备，除了您说到的资本和高素质的工人以外，还有一点就是成熟的、有经验的管理人员。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民营资本的发展看到一斑。1997—1999年，吴江民营资本的投资只有30亿元，2000年一年就增加了30亿元，2001年40亿元，2002年上半年36亿元。在所有这些投资中，外地资本仅仅占25%，绝大部分都是本地资本。大量资本的投入除了说明本地的投资实力以外，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对资本管理的能力。

费：经过20年的发展，到2002年秋天，当我再次到苏南进行调查的时候，我发现乡镇企业改制以后，苏南已经形成了一个从家庭工厂到现代大企业的多层次工业网络。

邱：根据您的安排，2002年秋天，我再次去了吴江市的横扇镇，您知道，那里家庭工厂生产的羊毛衫很有名。1997年我到那里的时候，没有见到很大规模的企业，车间一般都建在家里，最大的一家只有10多台手工织机。可2002年我看到，不仅工业厂房已经联片，家庭作坊也发展为成片的现代工厂，具有先进水平的电动横机、喷水织机大量进入了家庭企业。

费：总的来讲，“苏南模式”通过所有制改造和外资的引进，已经形成了多种



所有制并存、多种层次的工业并存、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和经济全面发展的格局，与“温州模式”的私有制和“珠江模式”的外资已经没有了本质的区别。

费：苏南模式的早期，是上海的技术力量引导之下出来的。

邱：这一点您在《小城镇、大问题》和后来关于苏南乡镇企业发展的多篇文章如《小城镇、新开拓》、《故里行》、《镇长们的苦恼》、《吴江行》等里面都一再重复过。当然，那个时期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给乡镇工业的发展留下了很大的产品空间。苏南的乡镇企业就是在上海技术力量的支持下，通过产品的“拾遗补阙”发展起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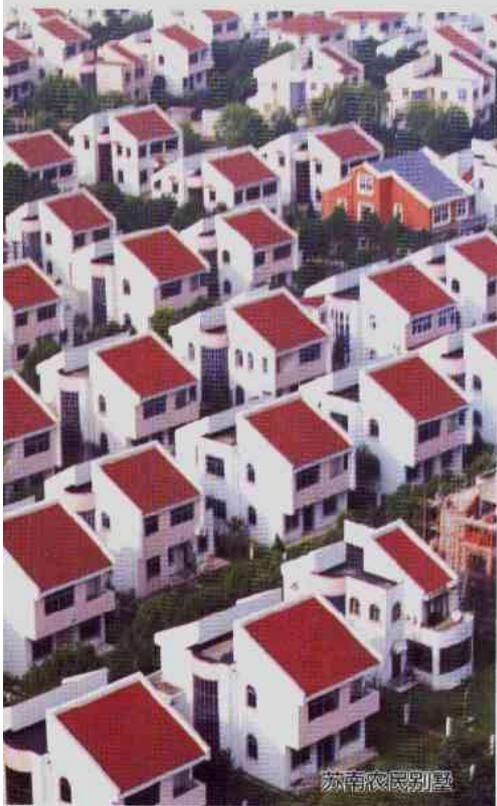
费：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苏南模式”是从社队企业发展出来的，是从公社制度中出来的，具有很强的地方性。比如昆山，昆山开始是不搞工业的，它的农业很好，但是工业发展滞后，在苏南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发展最旺盛的时候，昆山是落后



的。看到自己周围地区的工业发展起来了，昆山也弃农从工，希望依靠上海，可是上海不理它，上海主张肥水不流外人田，不积极与昆山联合。1990年我提出长江三角洲开发区的时候，吴江的县长还风趣地说，吴江与上海官方没有多少往来，乡镇企业与上海民间倒是难舍难分。现在看来，那个时候，上海是错失了一次机会。这就迫使苏南地区自己找门路，找外资，自己与外界建立联系，进入国际市场。

邱：记得1999年的春天我和您到过一次昆山，那个时候，昆山的台商投资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从那次的访问中，我们了解到，昆山多年以前就在寻找机会，他们认为，如果沿袭苏南其他地区的乡镇企业模式，很难实现昆山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此，他们利用了昆山农业基础好的优势，从农产品加工入手，引进外资，建立了当时最具规模的地方性工业园。在这个基础上，昆山利用其靠近上海的地缘优势，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立了苏南地区对外商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外商投资在短期内迅速发展。

乡镇企业改制以后，苏南工业发展的主导力量之一就是外资的大量进入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大量外资进入苏南，其中台湾有九分之一的老板在昆山落户，昆山累计实有外资企



苏南农民别墅

业2000多家，总投资额130多亿美元，注册资金65亿美元，其中投资超过1000万美元的有300多家，超过3000万美元的有100多家，其中台湾南亚集团投资的电子材料生产基地，预期总投资25亿美元。概括起来说，在昆山，50%以上的财政收入，60%以上的利税，70%以上的销售，80%以上的投资，90%以上的进出口都来源于利用外资。

费：苏州工业园也是一个例子，它抛开上海，找到了一个大的外资投资机会，直接进入了国际市场。当时，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一点，现在看，比较清楚了。

邱：根据有关资料，2002年，苏州市合同利用外资101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48亿美元，居同等规模城市第二，其中苏州工业园的GDP达到252亿元，财政收入达32.6亿元，占全市的11%强。建园以来，园区经济以年均近50%的速度增长，实现合同引资135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57亿美元，每个项目的平均投资规模都超过了3000万美元，10%左右的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在园区有投资。

费：20世纪90年代，上海看到了这点，他们赶紧到浦东，建立浦东开发区。当浦东开发区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便发生困难了，腹地不够。

邱：社队工业阶段，我们以为苏南是

上海的腹地，因为当时苏南社队企业的技术基本上来自于上海，社队企业的产品相当一部分都是为上海大工业服务的。但是，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上海忽视了这块腹地建设，把自己的腹地缩小到了上海行政区划内的地区如浦东。

费：地方主义阻碍了他们向周边地区辐射的步伐。本来江苏是拉上海的，但是上海要自己搞，建设浦东，希望把浦东的几个县建成自己的腹地，而忽略了江苏和浙江。一个时期内，上海确实发展得不错。在建设浦东的过程中，通过地产和交通建设，使浦东具有很好的投资吸引力。随着浦东可用土地的减少，吸引投资的优势不那么突出了。

这样，上海就面临一个大的问题，相对周边地区而言，发展的优势找不到了。在开发浦东之后，上海虽然开始开发自己的远郊县，但是远郊县的发展有一个过程。现在是外来投资的黄金时期，投资者需要的是成熟的投资环境。上海要把远郊县的投资环境发展到与苏南和浙东之间具有竞争力，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现在比较成熟的投资环境在苏南和浙东。

邱：的确，整个苏南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从无锡、常州、苏州直逼上海的工业经济带；浙东也形成了宁波、杭州、嘉兴甚至包括湖州的经济带。尤其是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设。根据有关资料，杭州湾跨海大桥北起浙江嘉兴海盐郑家埭，南至宁波慈溪水路湾，全长36公里，是目前世界上已建和在

建中最长的跨海大桥，它使宁波到上海的路程缩短120公里。预计2008年竣工，总投资118亿元。根据新华网的消息，绍兴也将投资62亿元，建设杭州湾绍嘉通道暨跨江大桥，大桥建成以后，将使绍兴到上海的时间缩短为90分钟，并由此直接把350平方公里的杭州湾绍兴工业新城区与上海连接起来。这样，大桥的建设不仅会直接把浙东经济最有活力的几个板块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庞大的工业集群，而且大桥建设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



开发浦东后，上海着手寻找新的发展优势

费：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不能忽视这个矛盾，不能忽视龙头与翅膀之间的矛盾。

邱：您在提出长江三角洲的时候，就把长江三角洲做了个形象的比喻，提出上海是长江经济带的龙头，浙东和苏南是这个经济带的两翼，长江是这条巨龙的脊梁，这条巨龙只有各方合作协调，才能展翅高飞。

费：但是龙头与翅膀之间有些矛盾，龙头不联合这两个翅膀，不要这两个翅膀，脱离了自己的两翼，去单独发展自己的郊县，想另外造一个翅膀。可是，这个翅膀又太小了，现在就觉得很痛苦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两翼也不得不自己找出路。现在，这两个翅膀自己发展了，虽然没有龙头指挥方向，自己还是飞起来了，而且与龙头之间形成了竞争。因此，龙头如何成为龙头，两翼如何成为两翼，共同展翅高飞，现在成了大问题。

由此看来，“苏南模式”提出的区域经济问题目前碰到了难题。大家都承认上海是龙头，上海也骑上了马背，但是，这个龙头和两个翅膀之间没有很好地联系起来，龙头遇到了问题。在我看来，真正的出路是龙头要帮助两个翅膀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形成一个经济发展的

层次，龙头与翅膀分工合作，形成世界经济的中心。

邱：刚才谈龙头与两翼关系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只谈到了两翼，就是苏南。您1990年写的

《长江三角洲之行》，也没有花太多的篇幅谈浙东。可是，浙东这些年的发展令人惊讶，虽然在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方面与苏南地区仍然存在一定差距，但是经济实力却与苏南地区不相上下。

根据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的资料，这个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1990年只有562.7亿元，2002年增加到了5481.8亿元，在浙江省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90年杭州和宁波两市占全省经济总量的比重只有38.1%，2002年提高到了42.8%。2002年，



浙东的财政总收入占到浙江省的62.6%。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全国2000多个县(市)的调查表明,就2001年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而言,浙江省26个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县中,浙东地区就有19个。

从这个意义上看,浙东与苏南已经真正形成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的两翼。

费:我当时讲两翼的时候,没有想到浙东发展会这么快,当时的确没有看到,我们也不是算命的,而是要看事物本身的发展。现在我们看到了,最近这些年,浙江的发展的确非常快,经济的规模和实力与苏南不相上下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是维持原来的格局,如果龙头与两翼之间的关系不作调整,龙头就会变形。

邱:用两翼来比喻浙东与苏南及其与上海的关系的确非常形象。不过,我们也看到,除了龙头与两翼之间不能发生矛盾以外,两翼之间也有一个分工合作问题,尤其是在两翼分属两个行政区域的条件下,如果处理不好,就很难避免矛盾。只要两翼之间发生矛盾,就会使翅膀的力量大打折扣,“长三角”这条巨龙就会发生问题。

不过,我们的这些担心似乎应该有所保留了,一方面我们陆续看到了一些有利于长江三角洲合作发展的迹象。2003年2月,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接受《浙江日报》访问的时候,充分肯定了上海对长江三角洲的影响力,提出了“虚心学习、接轨上海、真诚合作、互利共赢”的思路,希望进一步加强与沪苏两地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一体化。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发展的一些实际动作,如上海、浙江、江苏所属19个城市人事部门已经联合发布了《长江三角洲人才开发一体化共同宣言》,2003年8月,这些城市的人事局长在杭州就高层次人才智力共享、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互认、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资源共享、博士后工作合作机制、公务员互派交流学习、人才服务合作等六项工作签署了合作协议。

在此之前,2003年7月初,“长江三角

洲旅游城市15+1高峰论坛”,包括上海在内的苏南、浙东16个城市的旅游局长在杭州共同签署了《长江三角洲旅游城市合作宣言》,希望共同推进六个方面的合作,如共同构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4小时旅游经济圈,并最终实现16个城市的无障碍交通;共同开发旅游市场,互为市场,互为腹地,互送客源,打造长三角旅游的整体品牌等。

还有,由浙江提议,三地科技部门合作的“共建长江三角洲科技创新体系”也已经着手实施,作为这个体系的第一个项目“长江三角洲信息高速公路”已经启动。三地交通部门则提出了做好区域内公路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规划、建设的衔接与协调等工作,努力构筑“长三角”一体化公路交通体系。

为此,上海提出加速上海1小时都市圈的形成,江苏提出要实现苏浙沪“同城效应”,浙江决定投巨资接轨上海。还有,三地的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和信用体系建设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您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因为我们看到,尽管浙江已经提出积极接轨上海,江苏省也提出积极接轨上海,而且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也说,中央要求上海发挥好“一个龙头、四个中心”的作用,并表示上海只有主动融入长江三角洲地区,才能抓住机遇、共享机遇、拓展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内,尤其是在一些重要基础设施如港口和产业布局等方面,要加强三地的实质性合作,还有相当艰难的路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让浙东步苏南的后尘,将无疑使这条巨龙无法腾飞。

费:因此,上海一定要找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使得两翼的新生力量能够与之相辅相成,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好龙头。而这个位置,不能局限于长江三角洲,而要从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捕捉新的苗头,抓住新的苗头,把两翼看作是自己的力量,看作是自己的实力,让两翼发挥实力,龙头掌握方向,使龙头与两翼之间形成一个整体,并使得这条

巨龙能够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邱:当然,谁都不希望我们担心的情况出现。我们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担心,只是希望引起人们的警觉,使得长江三角洲在发展的过程中,少出现波折。顺便提一句,温州在反省这些年发展的经验教训的时候,也提出了要主动参与“长三角”的合作与发展,并努力争取成为“长三角”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知道,温州有4000多家企业,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有40多万人在上海和江苏从事工商业,如果温州加入进来,就更需要各方能够精诚合作,“长三角”也将有望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金色三角。

费:下面我再讲一讲京津冀的问题。

邱:1996年,您在《再话天津》中,提出了“联合京冀、强化腹地、利用良港,创建北方经济中心”。后来还提出了环渤海经济区的问题。



一体化的公路交通体系将加快长三角经济发展



苏州工业园区里的外资企业

费:这个问题虽然提出多年了,但在环渤海地区,还没有形成一个经济中心。现在看来,天津显然还没有成为这个中心。

邱:最近这些年,北京好像在试图扮演这个角色。有几件事情是值得注意的,一是汽车工业和其他新兴产业。在两个三角洲的制造业快速发展的时候,北京似乎并没有把制造业当作一个重要的问题来抓。北京有一些大型的原材料工业像首都钢铁公司、燕山石油化学公司等,但是制造产业并不突出。最近这些年,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变化。北京市已经把汽



住宅小区越来越注重环境美化

车、电子、制药等制造业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如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工程和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环境保护等。根据北京市的说法，到2002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40%左右，2003年上半年出口额中，70%来自于外商投资的高新技术企业，到2010年力求在一些重点行业、企业，关键领域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二是生产基地和工业园的建设。除了中关村科技园以外，北京市还开辟了四个生产基地，如顺义的汽车生产基地、通州的光机电基地、大兴的生物新医药基地和设在林河及八达岭园区的微电子产业基地。近郊县也抓住机遇，积极进行工业园建设，如顺义的空港工业园、韩国工业园；除此以外，北京还建设了各种类型的开发区如位于北京东南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三是工业布局的调整。在改造传统企业的同时，北京要把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成为国家科技创新示范基地、高新技术孵化和辐射基地、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使北部和东北部，以电子、汽车、食品饮料、轻纺服装等产业为主；南部和东南部以医药、化工、机械、仪表等产业为主；西部和西南部以石化、冶金、新型建材等产业为主。

费：尽管如此，我们还不能说北京就是京津冀地区的经济中心。实际上，现在我们还看不出中心在哪里，今后一定会

出来一个经济中心，来带动华北地区的发展。只是，这个经济中心目前还没有形成。

邱：除了经济中心问题以外，更早在1993年，您还提出了《关于加快发展环渤海地区的建议》。

费：我提的这些建议都没有下文，大概是时间还没有到。

邱：不过，一些专业人士似乎对环渤海地区的发展充满信心，尤其考虑东北亚经济发展的契机时，一些人更认为这个地区的钢铁、原油、原盐等资源优势型产业和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材料等产业，具有极好的发展潜力。

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地区的外商投资也日渐活跃。全球近百家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中，有40%以上在北京；就天津而言，外商投资企业已经超过了万余家，大连的外商投资企业也有近万家。还有，京津两地的政府已有积极合作的意向，北京要突出京津冀联合经济圈的概念，天津也提出积极靠近北京，促进京津地区的一体化建设。

当然，和两个三角洲地区的合作一样，环渤海地区的发展也面临一些问题，如机制问题、分工问题、流通问题等。显然，也不是很快就能解决的事情。

费：除了华北以外，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到时间。一个是东北，这次我去看了一下，大庆想成为一个中心。我在大庆期间，温家宝总理也去了。建立一个经济中心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东北要为争取在东北亚发展中应该有的地位做准备。虽然

我们现在还说不出一个什么地位，但这个地位是需要争取的。

在世界经济的格局中，我们要清楚自己的优势。我们有便宜的劳动力，如果没有很好的准备，这个优势就发挥不出来。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到了哈尔滨，和他们谈了这个问题，但是他们根本听不进去，叫我不谈人口问题，也不要谈移民问题。

这个问题，现在谈还来得及。在我看来，东北有几条集聚人口力量的防线。我们不能把人口一下子都放出去，要有步骤地放。一条是黑龙江，还有靠近边界线的几个地区，应当集聚人力，为开发东北亚做准备，这个问题应该成为当地的一项政策。

当然在这之前还要养活人口，利用东北广阔的空间养活人口，集聚人口。

邱：我很清楚地记得您还提过黄河上游多民族开发区的建议。

费：没有解决的还有大西部问题。对西部问题的考虑，应当把多民族作为前提。西部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多民族性。当然，西部也缺乏经济发展的中心。西北的中心，从历史上考虑，似乎应当放在河西走廊。汉朝开辟了河西走廊，解决了匈奴问题，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走廊地带，解决西北的发展问题。

邱：对西部的考虑，我们的确应该多重视那里的多民族性和历史经验，除此以外，无论是西北还是西南，还需要利用三线建设的基础。这是进行经济建设的老本钱。

费：西南开发的重点在于开辟同东南亚各国的通道。我曾经讲过要重开南方丝绸之路，但是现在还没有做到。

邱：换句话说，在西部的开发中，我们要做的是重开两条丝绸之路，一条是西北的，一条是西南的。贯穿历史，把握现实。

费：总之，对于中国各地区的发展问题，我们要看得远一些。举个例子，香港问题并不是回归了，问题就解决了。到现在为止，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只有等到香港人自己认为自己是大陆的一部分了，同大陆进一步联合了，问题才真正解决了。

(费孝通系著名社会学家；邱泽奇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本文由邱泽奇教授整理)

题字：吴元利 责任编辑：姚志华